

# “牧影”：中国流动电影放映再阐释 ——基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田野研究的讨论

郭建斌 王丽娜

## 摘要

所谓“牧影”，指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由流动电影放映相关的制度、人、技术等构成的媒介实践之阐释意义。这是基于长期田野研究所得到的一个分析概念。本文首先对“牧”字进行了词源学的考证，在此基础上，结合“代理”、“具身”等相关理论资源进一步充实了“牧影”概念的理论意涵，以期对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相关现象做出再度阐释。

## 关键词

“牧影”、流动电影放映、阐释、田野研究

## 作者简介

郭建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dulong20022002@aliyun.com。

王丽娜，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教师。电子邮箱：24783600@qq.com。

本文为云南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民族传播研究与媒体人类学”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项目号：C1762402002）。

## “*Duojie Lo:nian*”<sup>1</sup>: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Mobile Film Screening: Discussion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in the “Big Triangle” Region of Yunnan, Sichuan and Tibet

GUO Jianbin WANG Lina

## Abstract

The term *Duojie Lo:nian* is an analytical concept derived from prolonged field researches and is intended to interpret the media practices which encompass the institutions, personnel and technologies concerning mobile film screening in China's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e paper firstly examines the word “M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ymology and then, by drawing upon relevant theories of “agency” and “embodiment”, it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Duojie Lo:nian*. Hence the paper complete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mobile film screening.

### Keywords

*Duojie Lo:nian*, Mobile film screening, Interpretation, Field research

### Authors

Guo Jianbin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the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dulong20022002@aliyun.com.

Wang Lina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Yunnan University, and a teacher of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24783600@qq.com.

This paper is the periodical achievement of the innovation team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media anthropology”, a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Yunnan University( NO.: C1762402002) .

自2010年夏天开始，作者<sup>2</sup>作为课题负责人在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开展了一项与流动电影相关的研究。此项研究的田野调查前后持续了五年多，相关成果已经陆续发表、出版（郭建斌，2019a，2019b；郭建斌，陈静静，2018；郭建斌，张静红，张翎，陈静静，2018；郭建斌，方鑫，念鹏帆，2017；郭建斌，2016，2015，2014）。但是当我们再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感觉到原来书中所提到的“牧影”<sup>3</sup>（郭建斌，2019b：182—189）概念并未得到应有的展开，有些可惜（王丽娜，2019）。这里所说的可惜，主要在于失去了一个本土经验与相关理论话语进行整合并形成新的理论表达的机会。因此，我们开始对相关的文献进行耙梳，并适当援引调查资料，以期对“牧影”这样一个“编造”出来的概念可能的理论意涵进行阐发，使之成为一个对于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现象具有一定理论解释力的学术概念。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样的阐发对于深入理解流动电影在中国的特定意义，以及当下新闻传播研究中关于媒介与技术的讨论，乃至“代理”“具身”等概念，均具有一定启发。

## 一、现象呈现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收集到了大量关于电影放映员的访谈资料。在已经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中，这些资料未能完全呈现。作者也曾试图对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进行讨论（郭建斌，刘展，2011），但是由于当时田野调查才开始不久，掌握

的资料有限，在理论思路方面也未能有更好地拓展。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也不能完整地呈现相关的田野资料，只能选择其中的几个片段。

以下是2012年8月15日我们在西藏昌都八宿县邦达镇对该镇电影放映员（Z）的访谈<sup>4</sup>：

Z：有一次我们到卡瓦白庆，就是那个，叫卡斯村。这里到那边的话，走路的话，需要走四天。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发电机，里面不是有个碳刷吗？就是发电的那个碳刷，你知道吧？（Z看我们不知道，所以问我们）

CH：是不是活塞那种？

Z：不是活塞！碳刷。

CH：碳刷，碳刷。

Z：啊，那个没有了，已经用完了，到了那个地方。走四天的路啊，我们。发动机发得燃，没电。最后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用那个干电池，干电池中间不是有那个芯子嘛，那个磨平，磨平之后再用电火烧，那个烧了以后再装起，就可以放。

G：喔！干电池中间那根碳棒，（Z：对，对）磨了之后用电火烧。

Z：对，这个是我想的办法。到了那个地方，我们有两个放映员嘛，没办法，那天晚上准备放电影的时候，就没电了。没电的话，我们到处修，修了的话就没碳刷了，碳刷已经用完了。就用那个，我们在那儿放了电影。还有那个，激励灯，灯泡（Z似乎也看出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激励灯”这个词，也是我们在整理录音的时候才通过资料查到的）就是声音嘛，那个，激励灯，灯泡烧了。那个灯泡烧了的话，我们用那个电筒，用手电筒可以放，也有声音。

G：哦，用手电筒放？

Z：啊，手电筒可以放。就这样也放过。

G：手电筒那个光够吗？

Z：手电筒，它那个声音的光，不是光线。激励灯你知道吗？

G：我不知道这个。

CH：和拷贝一样，把音声转变成不同的胶片厚度。

Z：对，这样我们也放过。有时到了远的地方以后，没办法了。这个地方交通方便，你可以到处去，找一些那些东西嘛。到了那边的话，没办法，找不到。就想这些办法我们放过。

G：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的时候得自己……

Z：想办法，不是的话，没办法。

G：放映员一般都还是技术员，所以，技术方面……

Z: 自己修啊, 那些机子的话, 没人给你修, 到了那边的话。你修不好的话, 只有送到县里面去, 县里面修不好, 到昌都去, 这个样子, 一步一步地往上拉。

G: 那有没有出去了, 拉出去一两天, 放不了又回来, 这种情况有没有?

Z: 这种情况也有, 但是我们又骑马过来, 到这来, 到这来了以后, 到县里面去, 把机子修好, 修好了又回来, 又到那个村子去放。这样子也有, 我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用右手把鼻烟弹到鼻孔里, 并吸了几下)

.....

以上只是我们众多的访谈资料中的一个片段。在我们对“大三角”地区电影放映员的访谈过程中, 放映员讲得最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流动电影放映过程中的艰辛, 二是各种设备故障。尤其是后一个方面, 使得放映员成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村最为重要的“技术能手”。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再度引述一段田野笔记记录的资料:

到了有学校的地方, 学校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要教电的知识。要教电力基础知识, 学校老师有些讲不来, 我们来了, 老师请我们讲一堂课, 电力基本知识。我们就不厌其烦地去上课, 同时我们自己也更熟悉了。人家请你去讲课, 你不把电工基础好好熟悉就去讲, 就要闹笑话。电影队到了各个地方, 做的好人好事不少。比如给群众理发, 帮老乡修各种东西, 尤其在生产队时期, 顺便要帮各个生产队修理柴油动力机、柴油发电机、柴油脱粒机。比如这个生产队搞秋收, 要脱粒, 靠人来打就要耽搁很长时间, 人还没打完麦子就要生芽了。用脱粒机就要用柴油发电机, 出了问题就不会修。放映员从电力知识, 动力什么都了解, 就帮生产队修发电机, 走一个地方修一个地方, 老百姓相当有好感的。比如我们在康定, 新都桥的, 或者姑咱的老百姓就传放电影的要来了, 就高兴。那边的老百姓将发电机称之为“电影妈妈”, 把放映机称之为“电影爸爸”, 不说是电影队的人来了, 说“电影妈妈”来了, “电影爸爸”来了。<sup>5</sup>

2012年11月23日, 作者对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毛羽副局长进行了访谈, 下面是从访谈资料中截取的一段<sup>6</sup>:

G: 就你了解的情况, 这样一个体系, 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吧?



M: 别的国家没有这样的国情, 没有这么多的农民, 没有这样一个政府, 还去考虑你看不看得到电影。

G: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也在做一些翻译, 看到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些资料, 像非洲等,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了解在类似的发展中国家, 政府在推电影的时候, 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M: 别的国家没有这样的政府, 中国这样一个政府, 它什么都要去(管), 用有些人的话说: 你管他干嘛! 美国政府才不管这些事情, 你看不看得到电影,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中国政府不一样,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你面临着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你通过市场, 你能解决吗? 怎么办? 现在国家有国力了, 所以十六大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是建立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所以我们的“2131”工程, 十六大以后, 我们就改名字了, 就不叫“2131”工程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让全国的老百姓知道“2131”工程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在十六大以后, 按照领导的指示, 我们改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更加通俗。这个工程, 过去可能就是广电总局, 可能就是文化部, 可能就是发改委, 可能就是财政部, 这个部我们在做的一个工程。但是, 十六大以后, 我们的这个工程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工程, 国家的、在农村的几大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工程之一, 有“村村通”, 有“信息共享工程”“农村书屋”等等, 我们是其中之一, 就变成了一个工程建设。为了这个工程建设, 我们在技术上去做保障。

这样的田野资料还有很多, 正是这样一些丰富的田野资料, 不断地启发着我们的理论思考, 在思考的过程中, 也不断地有新的理论表达浮现。这或许也正是田野调查成为研究的源头活水的原因?

## 二、何谓“牧影”?

田野研究中的任何一段经验材料, 均只是一个片段, 多个片段, 才能拼贴出一个完整的整体。如同本文开头所说的, 本文的研究将聚焦于当代中国的流动电影放映活动, 期望对这样一种活动进行整体地考察, 并解释其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转换为问题表述, 即: 中国流动电影放映这样一种媒介实践可以做出怎样的“文化的阐释”(或“深描”)?

前面已经做过说明, “牧影”这一概念, 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雷蔚真教授首先提出来的。在此, 简单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 2014年底, 作者应邀到安徽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天晚上, 作者和潘忠党、雷蔚真两位教授坐在合肥街头的一个酒吧里喝饮料。作者向两位教授求教关于书稿修改的事宜。雷蔚真教授曾在藏区做过研

究，他对藏区有所了解，对于我们此前的研究也有所了解。当时的酒吧的正大厅里也有一块银幕，正在放着电影。在光线昏暗的酒吧里，我们三个人的话都不多。突然，雷蔚真教授说到是否可以用“牧影”，我的思路顿时就被拉回到了在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田野调查的那些场景之中，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概念。潘忠党教授没有马上接话，但是从他不多的话中可以猜出——这或许还是一个不错的建议。此后我们讲到了“牧”字在中国社会中的特定含义，也讲到了英文中的priest一词翻译为中文“牧师”等问题。

对流动电影这样一种特定的媒介实践（或是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其可能的理论视角是多种多样的。李道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讨论（李道新，2006），张新科对20世纪50—80年代的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进行过考察，把他（她）们称为“文化捐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和“生活使者”（张新科，2006）。徐霞翔也以20世纪五十年代的江苏省为例，对农村电影放映员进行过考察（徐霞翔，2009）。刘广宇对新中国红色放映员的身份及江津某个特定时段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历史进行过考察（刘广宇，2007，2008）。张启忠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对十七年时期的“露天电影”进行过考察（张启忠，2010）。美国学者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在对尼日利亚电影进行研究时专门对该国的流动电影（称之为“魔力奇”）进行过讨论（拉金，2008/2014：102—168），尼日利亚的某些情况，与中国当下商业院线与公益院线两条院线并存的情况具有某种相似性。在我们围绕“视觉展演”（郭建斌，张静红，张翎，陈静静，2018）概念所做的讨论中，也涉及电影放映方面的内容，但是那样的考察，包括了放映与观看等方面，并不仅仅是聚焦于电影放映。上述这样的一些相关研究，自然有价值。但是，上述相关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视野，还是结合本土经验形成特定的理论表达方面，均留下了较大的问题空间。

“牧影”虽然只是一种通俗的表达，但是一旦对其赋予特定的意涵，其就能够获得一种理论上的优势，成为又一个考察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的不错的操作性概念。

在此，我们对本文所使用的“牧影”概念做出如下界定：


所谓“牧影”，指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由流动电影放映相关的制度、人、技术等构成的媒介实践之阐释意义。



下面，我们将对“牧影”的意涵做出更为详尽的阐明。

### 三、“牧”字考释

“牧影”这样一种表达之所以让人感觉空灵、蕴含着巨大的想象力，主要取决

于“牧”字在中文中丰富的含义（郭建斌，2019b：182），因此，要想对“牧影”所具有的理论意涵进行阐发，首先便需要对“牧”字的词义进行考释。

在甲骨文中，“牧”字的写法是：。从甲骨文字形来看，“牧”字是由“牛”和手持棒以赶牛之形（“攴”）两部分会意而成。可见，“牧”字的初始意涵是“放牛”，并逐渐扩展为牧放一切牲畜，即作“牧养牲畜”讲。由“牧养牲畜”这一动作，进而“牧”字便有了“放牧之人”这一意涵。比如《诗·小雅·无羊》中的“尔牧来思，何蓑何笠”。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即将“牧”字释义为“养牛人也。从攴从牛。”

同时，在甲骨文中，“牧”字还有一些字形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表示行进之意的“彳”或者足之形而成，如或。这表明牧放牲畜的活动是一个不断行走、追逐的过程。因而，“牧”字本身还隐含着一种流动、变化之意。

此外，“牧”字还具有明显的空间意涵。比如《尔雅·释地》中的“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这里的邑、郊、牧都是古代对于地域范围的划分。其中，邑是城邦，而郊、牧则是以邑为中心，由近及远，不断向外拓展的郊外。并且，牧较之于郊，距离邑又会更远一些。由于“牧”作“郊外”讲总是以邑为中心，也就是说，“牧”所表示的空间和邑所代表的空间是相对立且对应的，因此，“牧”字的空間意涵中便具有一种中心-边缘的色彩。

在这里，我们已经述及了“牧”字的三种含义：“牧养牲畜”“牧养牲畜的人”和“郊外”。同时，对“牧”字中隐含的“行走、流动”之意也进行了析解。应该说，这样的一些意涵，和本文意欲使用“牧影”这样一个概念来讨论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是非常契合的。首先，本文所考查的田野区域，是位于云南、四川、西藏三省交界处的“大三角”地区（具体是迪庆、甘孜和昌都）。这样一个区域，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都始终处于与中心相对应的边缘位置。也就是说，“牧”字所具有的边缘空间意涵和“牧影”所讨论的流动电影较为特殊的放影区域之间是可以形成某种对应的。其次，在“大三角”地区，牧业是最重要的生计方式。自然，“牧民”也就成为了这一区域最有代表性的身份类型。当地不少的电影放映员，在成为放映员之前，也放过牧，有些人甚至在做了放映员后还偶尔从事这项工作。并且，流动电影的主要观众也是牧民。从这个意义上看，“牧影”又是和“大三角”地区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最后，是“牧”字中隐含的“行走、流动”之意本身也符合流动电影在不同地点流动放映的特征。这种流动性，在电影放映员那里被称为“转点”。作者也已从学理层面提出

了“转场”这一概念加以讨论（郭建斌，2019b：127-131）。正如有放映员告诉我们的，他喜欢到处去放电影，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

上面的这些讨论，表明了“牧影”这样一种表述用来解释在“大三角”地区这样一个特定的区域背景之内展开的流动电影放映实践的适宜性。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古文中，“九牧”一词用来指称“九州”，而“九州”即天下，因此，当“牧”字作空间概念讲时，甚至可以超越某一特定的空间界限，指向于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这也意味着“牧影”这一基于特定地区流动电影放映实践而形成的表达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跨越“大三角”地区，而指向更大的范围。换句话说，“牧影”这一表述用来讨论整个中国流动电影放映实践或许也是可行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牧影”的解释效力。

行文至此，似乎只解释了“牧影”针对特定区域背景和特定媒介实践（即流动电影）的可行性，似乎还不足以表明“牧影”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意涵。在我们看来，如果想要理解“牧影”这样一种表述所蕴含的理论意涵，需要从“牧”字的政治意涵入手。一般而言，“牧”字的政治意涵，具有动词和名词两种不同的用法。就动词而言，主要是将“牧”引申为“治”，即以牧民养畜比喻人君、官吏治民。由是“牧民”一词就具有了“治理人民”之意。比如《管子》中就有专门的《牧民》篇，用以讲述治民之道。其开篇第一句便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同时，“牧”字的部首“攴”，是“攴”的异体字。林义光《文源》云：“（攴）象手有所持形，犹治事之意。”可见，“攴”字具有举手作事之意，是从上位主动施予某种动作。而按照《说文》对于“攴”的解释，“凡攴之属皆从攴”，也即但凡从“攴”之字均具有“攴”意，这就意味着，“牧”字作“治民”讲，同样是一种主动从上位施予的行动。换句话说，“牧”字中必然含义一种阶序结构。这样一种阶序结构在“牧”字作名词时更为鲜明与突出。就名词而言，“牧”字主要被用作职官名，并且经历了一个从掌六畜之官向治民之官的官职转变。早在甲骨文中，“牧”字便用来表示掌牧牲畜之官，《周礼·地官·牧人》中的“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同样是此意。同时，“牧”作职官名还可以指治民之官。这样一种官职自西周伊始便逐渐流行和普及开来。比如《尚书·周书·立政》篇中记载有西周的职官制度：“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按照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的解释，“三事”即为任人、准夫、牧夫三职。其中，“牧”是掌管民事之官。而由于古代以州划分，因此也称作“州牧”，也即是州官。同时，“牧”作“州牧”讲在汉代以后进一步凸显，与此相关

的,还有“牧守”“牧伯”“牧宰”等职。

事实上,这里“牧”字的动词用法和名词用法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作为名词的官职是作为动词的治民的前提;而作为动词的治民则是作为名词的官职的结果。因此,如若把这两种用法结合在一起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牧”字的政治意涵中,既嵌入了一种制度,也蕴含着这种制度的实施过程,而身处于这一制度—行动/结构—行动中的“州牧”们,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成为了这些制度的践行者,其意图或目的便是“治人”。这样的讨论,便使得“牧”字从理论层面与“代理”形成了勾连。进一步讲,“牧影”也获得了某种“代理”的意涵。

#### 四、“牧影”作为一种“代理”

上一部分对“牧”字的考释一方面说明了“牧影”同流动电影的特性及其特定的放映区域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更进一步发掘出“牧影”中所隐含的“代理”意涵,并且这种“代理”主要体现在制度层面——正如“州牧”这一官职在西周、汉代的建立和普及本身也是源于当时的职官制度。应该说,这就为讨论“牧影”的理论意涵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以下从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 (一) 制度层面

尽管这里将“牧影”理解为“代理”是从制度入手,但正如夏皮罗(Shapiro)所言,政治学领域对于“代理”的讨论大量借鉴了经济学(Shapiro, 2005),因此,有必要先对经济学中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进行适当回溯。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代理理论主要用以描述两者或两者以上组成部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一部分人被看作是委托人,可以“授权”另一部分人——即代理人来执行某些代表自身利益的任务(Ross, 1973; Moe, 1984)。由此,二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代理关系。但是,基于经济人等假设,加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和目标函数的不一致,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欺骗、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代理问题。因此,克服代理问题需要设计出能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达成均衡的契约。而在对最优契约的讨论中,代理理论认为关键应是对代理人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由此可见,委托人、代理人、授权、代理问题、契约等构成了代理理论的基本要件(Eisenhardt, 1989)。

尽管自诞生伊始便遭受到了行为假设、理论包容力等方面的批评,但在质疑、检验、修正的进路中,代理理论仍然持续向前推进和发展,并且正逐渐从学科内空



间拓展向学科外空间。现在，除了与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会计、金融、营销以外，代理理论也被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或分析工具大量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Eisenhardt, 1989）。特别是政治学领域，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代理理论已被广泛地用以分析诸如政党政治、议会民主、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公共服务提供、中央与地方关系和欧共体政治等多种议题（刘寿明，陆维臣，2009）。

和西方相似，我国对代理理论的探讨也经历了一个从经济学向政治学不断渗透和延伸的过程。当下，除经济领域外，政治领域已成为国内运用该理论最为重要的一个面向：首先，是基于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公共选择理论等，认为政治领域必然存在一个委托—代理的向度，进而去解析政治领域这种代理关系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在此基础上，对政治领域代理关系的多重性进行分析（倪星，2002；刘寿明，陆维臣，2009）。其次，一些学者认为尽管代理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共领域的代理和私人领域的代理具有显著的差异。进而，他们比较了公、私领域代理的不同：比如政治领域中的代理，存在着委托人客体化（成为被管理者）和代理人主体化（成为管理者）的情况；代理人的选择具有非竞争性、强制性等（王振海，2003；刘寿明，陆维臣，2009）。再次，是对政治代理关系中一些常见的代理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剖析，并进一步聚焦于如何设计出能够消解代理问题、实现激励兼容的政治契约。研究中指出的一些常见代理问题包括：公共政策执行的非经济性和偏差（丁煌，定明捷，2008）；代理人的“败德”“短期”“共谋”行为（李春成，2000）；寻租和腐败（倪星，2009）；以及地方官僚的“应声虫”现象等（江依妮，曾明，2010）。从次，是将委托—代理理论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去讨论公共管理和行政治理中诸如土地产权（陈剑波，2006）、耕地保护（王玉琼，2004）、环境治理（罗慧，王毅敏，仲伟周，顾润源，2005）等多种现实议题。最后，是对基层治理主体的代理人角色和身份进行分析。无论是被称为“国家代理人”（吴毅，2002）、“谋利性代理人”（陈盛伟，岳书铭，2006），还是“新代理人”（李祖佩，2016），基层治理主体都被赋予了国家代理人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同时，相关研究所关注的基层治理主体，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基层政府在积极推动社会“再组织化”过程中培育出的非政府治理主体（王阳，曹锦清，2017）；一类是村治主体。其中既有村委会和村干部等传统的村治主体，也有在项目进村背景下，对乡村传统治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变化的项目开发主体（刘智睿，申明锐，张京祥，2018）。并且，学者们普遍认为，无论是这些“非政府治理主体”，还是“村庄项目开发主体”，在某种程度上



所扮演的都是政府的“临时代理人”的角色。

应该说,“牧影”中的“代理”直接指向了上述讨论中的最后一个维度,即流动电影放映员作为一种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赋予。一般来说,“大三角”地区的电影放映员主要由两类构成:一类是电影管理站的在编放映员和区、乡公务员充任的放映员。甚至其中不乏“兼职”放电影的基层干部和领导;一类则是社招的放映员和政府临时工充当的放映员。陈静静将这两类不同的放映员以体制内/外加以区分(陈静静,2015)。就体制内的放映员,其代理人的角色是不言自明的。而对体制外的放映员而言,则可以从“临时代理人”这样一个视角加以理解。<sup>7</sup>

但是,作者在开篇已指出,“牧影”这个概念意欲实现的是对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的整体考察。因此,倘若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入手,“牧影”作为一种代理,就不应仅仅停留在放映员的代理人身份这一层次,而是应将流动电影本身看作是一种代理。为什么流动电影能够成为一种代理?在陈静静对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流动电影放映的考察中,她引入了诺斯(Douglass C. North)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国家理论作为分析流动电影制度变迁的基本工具。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诺斯所提出的这个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三位一体的制度变迁模型充分说明了国家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决定了制度的变革和推动;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变革和推动的过程又伴随着国家在经济效益追求和意识形态询唤之间的不断摇摆。从这个意义上看,制度事实上就是一种经由国家“授权”的意图和实践。可见,在诺斯那里,制度就是国家的“代理”。而就流动电影放映而言,本身便是基于国家制度设计的结果。<sup>8</sup>换句话说,流动电影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因而,电影放映制度也就必然构成了国家权力的“代理”。同时,在陈静静的讨论中,她进一步指出:国家权力通过对流动电影进行制度设计,已经使得流动电影放映的过程从行为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对乡村民众实现了监控。这就意味着,流动电影放映活动业已成为国家权力的监控制度(陈静静,2015)。由是,流动电影放映本身也就同样具有了“代理”意味。甚至,进一步理解,在流动电影放映-电影放映制度-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多级层次的代理关系链。而如果把上文的电影放映员也考虑进去,那么这个多级代理关系又进一步扩展为:放映员-流动电影放映-制度-国家。

## (二) 技术层面

除了制度层面外,一些学科在讨论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时,也会经常使用到“代理”这个术语。也就是说,人和技术之间被理解为是一种代理关系。比如美

国科学人类学家唐尼·盖瑞（Downey Gary）就将发生在人和机器之间的相互行为定义为代理。通过加入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CAD/CAM实验室，并对学生学习CAD/CAM技术的过程进行深入地参与观察与访谈，盖瑞展现出学生在掌握这门技术的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学习CAD/CAM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通过掌控机器提高工作效率的过程，相反，这个过程涉及到超越预期地被机器控制、向机器妥协、适应机器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也就是说，人是在控制机器和被机器控制之间来回博弈与协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得人和机器之间出现了一种中间状态。在这个状态当中，人有了一部分机器的特征（machine in me），机器有了一部分人的属性（me in machine）。进而作者指出，正是这种中间状态，使人和机器各自成为了对方的“代理”（Gary, 1998）。也就是说，一方面，技术被植入到人体之中，并且其发挥作用需要依赖于人类代理（human agency）；另一方面，人的某些特质也投射在机器上，并代替人实现某些意图，从而机器也成为了人的代理。

此外，荷兰哲学家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在他的“道德物化”理论中也提到了“代理”。维贝克的这一理论建立在拉图尔（Latour）对“行动者”（actor）的讨论上。在拉图尔那里，人和非人（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都被冠之以“行动者”的位置。和拉图尔一样，维贝克首先将作为非人实体的技术物看作是能动的行动者，进而将人的道德属性赋予了技术物。也就是说，维贝克认为技术物本质上是一个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只要对其进行负载伦理价值的道德设计，“他”便能在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的行为产生道德约束或指引。正是这样一个道德赋予和道德监督的过程，维贝克认为技术物成为了人的代理：即这是人对技术物的“授权”，赋予了其特定的道德行动程序；由此，技术物变成了人类道德行为的规范者，可以代替作为道德监督者的某些人行使道德引导和规范的职责（Verbeek, 2006, 2011）。应该说，在维贝克对于“代理”的讨论中，尽管其偏向的是技术作为人的代理这样一个面向，但是，由于技术的道德“脚本”是由人写入的，或者说是由人规定的，这似乎意味着技术的道德引导作用还是离不开其人类代理。因此，维贝克的的思想中仍然暗含着一个人和技术互为代理的维度。

事实上，在流动电影放映中，电影放映员和各种放映设备、器材、技术之间同样体现出一种代理关系。一方面，电影放映如果真正聚焦到放映过程，是放映设备自动进行和完成的，这就意味着，放映设备和技术成为了放映员的“代理”<sup>9</sup>；另一方面，放映设备要正常和顺利运行，又离不开放映员的调试、操作、维护和修缮。也就是说，仍然需要依赖于其人类代理。因此，“牧影”作为一种“代理”，就不

应仅指向制度层面，还应包括技术层面。由于这方面的田野材料在本文的开头已经呈现，这里便不再过多阐释。

## 五、“牧影”与“具身”传播

“牧影”作为一种“代理”，可以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制度层面的“牧影”指的是作为国家权力代理的流动电影本身。这样一来，与流动电影有关的放映员、放映实践和制度都具有了“代理”的意涵；而技术层面的“牧影”强调的是人和技术之间的代理关系。按照上文所述的盖瑞的观点，在这种人-技关系中，技术既被植入到人之中，人也嵌入在技术之中，这样的一种视角使人很容易想到的便是近年来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语：“具身”。为了能在“代理”（即“牧影”）和“具身”之间形成一些理论上的对话和勾连，这里先对“具身”进行一些介绍与梳理。

“具身”一词源于哲学领域对身心关系问题的二元性思考。众所周知，自柏拉图（Plato）、笛卡尔（Descartes）伊始，身心二元论就一直是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身心观。但是，这样一种理解也对诸多哲学家造成了持续性的困扰，并进而去探寻如何超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现象学。从胡塞尔（Husserl）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再到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都是这条超越之路的典型践行者。特别是梅洛-庞蒂，一方面，他延续胡塞尔对于意向性的讨论，认为所有人的经验都是有所指向的；另一方面，他又将意向性的主体从胡塞尔那里的意识转向了身体。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庞蒂那里，“意向性就是主体的态度或身体运动对世界中对象的具体空间指向（direction）。”（何静，2019）也就是说，庞蒂认为，当身体通过自身的行动指向世界中的对象或事物，便产生了对这个意向对象的意义。而如果没有身体意向性，即使对象的意义已先前存在，人们也无法感知。从这个意义上看，是身体将主体带入了对象和世界之中，并使主体获得了对对象和世界的知觉。因此，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核心便是将身体作为了一种知觉或经验的途径和方式：“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梅洛-庞蒂，1945/2001：116）在此基础上，庞蒂提出了一个“具身的主体性”（embodied subjectivity）概念。根据伏萨尔-波利（Fusar-Poli）等的评述，这个概念既不把人视为脱离身体的心智，也不把人看作纯粹的机器，而是把人视为活生生的、积极的创造物，其主体性便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理性互动来实现的。这就为克服身心二

元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转引自叶浩生，2011）可见，庞蒂所谓的“具身”，遵循的还是他对于身体的理解，即身体作为一种知觉和经验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是身体将认知与世界连接在一起。这样，身体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身体，而成为了知觉身体。

在庞蒂之后，美国技术现象学的代表人物唐·伊德（Don Ihde）也对“具身”进行了讨论。一方面，伊德认可梅洛-庞蒂等人将身体作为一种知觉方式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人一旦离开伊甸园来到尘世，其活动就总是嵌入在技术之中的，因此身体对世界的感知是经由技术的中介实现的：“‘作为身体的我’（I-as-body）是借助技术手段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伊德，1990/2012：77）也就是说，技术位于人和世界之间，处于一种居间调节的位置。由此，伊德指出，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应该首先理解为一种具身关系（embodiment）。可见，在伊德那里，具身关系就是指技术纳入到人的身体之中，身体和技术成为了一个整体，人是通过这个技术身体<sup>10</sup>来和世界发生联系的，并由此定义和修改世界。比如伊德举到了一个眼镜的例子。当人们戴上眼镜时，人和眼镜便形成了一种具身关系。因为作为技术的眼镜和作为身体器官的眼睛是合二为一来作为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和途径的。

由此可见，现象学中对“具身”的讨论主要指向两层意涵：一是指作为知觉和经验的主体（即知觉身体）；二是指作为知觉和经验的技术身体。它强调的是技术在身体中的纳入。这两个意涵的共同点是都将身体作为一种知觉、体验和连接世界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接触与经验是否需要经过技术的中介。

事实上，当下新闻传播研究中对于“具身”的讨论，也基本是在现象学的认知视野下展开：首先，既然具身中一定含有一个身体的维度，相关讨论也必然会去关注传播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即对传播中的身体问题进行聚焦。比如刘海龙认为身体是传统的传播研究中一直被轻视的议题。进而他通过爬梳传播学的理论遗产中对身体议题的讨论，指出了身体研究对于未来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刘海龙，2018）。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具身”这一概念可以超越两种经典的传播观念——传递观和仪式观面临的问题，由此再次凸显出“具身”对传播研究的价值（刘海龙，束开荣，2019）。刘明洋和王鸿坤以“身体参与传播活动的完整度”为划分标准，从媒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将媒介形态分为身体媒介、无身体媒介、身体化媒介和类身体媒介四种类型（刘明洋，王鸿坤，2019）。孙玮通过描述传播主体从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过程，呈现并阐释出传播与多种身体形式、多重在场方式的复杂关系（孙玮，2019）。刘婷、张卓则研究了麦克卢汉思想中被忽视的身体-媒

介/技术之维（刘婷，张卓，2019）。此外，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在沉浸传播时代讨论身体与媒介，应该将身体定位于现象学意义上的“知觉身体”（曹钺，骆正林，王颀濛，2018）。其次，是对人和各种新技术之间的具身关系展开讨论。比如黄旦指出，由于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已然成为了人体的“器官”，因此，人和这些新媒介之间便构成了一种具身关系（黄旦，2016）。高莉莎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将手机称为具身化媒介（高莉莎，2018）。再次，是对各种新技术嵌入身体后所导致的传播主体的变化的讨论。比如孙玮认为，随着技术和人的融合进程的加剧，传播主体正在经历从自然人向赛博人的转变。并且，她指出随着技术嵌入身体的加深，传播主体将会逐渐演化出完全脱离生物基础的非人类身体（孙玮，2018）。这种非人类身体在林升梁等人的表述中，就是以作为“第六媒介”的智能机器人为代表（林升梁，叶立，2019）。最后，是对各种具身传播实践展开分析。比如刘海龙认为VR技术就是一种典型的具身性的传播实践（刘海龙，束开荣，2019）。谭雪芳分析了图形化身、VR共生和数字孪生三种不同的具身实践形态（谭雪芳，2019）。此外，还有不少研究是围绕新技术（主要是VR/AR技术）引发的新阅读范式——即“具身阅读”展开的（吴倩，2019）。

但是，在我们看来，尽管上述讨论的理论资源是取自于现象学，但对现象学中“具身”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甚至也有一些偏差。比如，既然新闻传播研究要引入“具身”这样一个术语，似乎首先应该明确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具身传播？——或者借用刘海龙的表述，就是什么是“具身性的传播实践”？与之相关的，必然牵涉到什么是具身性的媒介。以上面提及的文献为例，似乎多数学者都认可手机、VR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介是具身媒介。也就是说，这些学者的基本思路都是遵循于伊德提出的“（人-技术）→世界”这一解释模型，是在作为知觉和经验的技术身体这样一个面向上来讨论“具身”的。但是，如果按照前文对“具身”的阐释，“具身”除了技术身体，还有知觉身体这样一个维度，换句话说，身体本身也应作为具身媒介加以理解。诚然，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有所意识（刘海龙，2018；刘海龙，束开荣，2019；刘明洋，王鸿坤，2019；孙玮，2019），但大量的讨论却还停留在一个相对狭窄的视野，未尝不是一种遗憾。刘海龙指出的传播研究忽视身体维度的问题，确实是事实。

更进一步理解，如前所述，刘明洋和王鸿坤将媒介划分为身体媒介、无身体媒介、身体化媒介和类身体媒介四种类型。其中，身体媒介是指以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来传递信息。无身体媒介是指纸质出版物、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形态。作者认



为，由于视觉、听觉符号代替了身体语言，因此传授双方的身体无需在场便可实现信息传递。身体化媒介是指人以节点的形式存在于互联网、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上，这时的身体是“数字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身体的返场。而类身体媒介则是指技术嵌入到人体中，于是身体成为了人和技术的联合体（刘明洋，王鸿坤，2019）。可见，在二者的讨论中，身体被排除在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之外。换句话说，“具身”被排除在了这些媒介之外。但是，这种理解似乎同样值得商榷。按照伊德对技术具身的讨论，具身是“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技术融入我的经验中，我是借助这些技术来感知的，并且由此转化了我的知觉和身体的感觉”（伊德，1990/2012：78），可见，只要技术能够对人的知觉或经验进行调节和转换，这样的技术就应该是具身的技术。而麦克卢汉在“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中早已指出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都是人的感知器官的延伸，也就是说，这些大众媒介技术同样在对人的知觉体验进行着调节，因此，它们又何尝不是伊德所谓的具身的技术呢？进一步深入，事实上，在伊德那里，“具身”还有强弱之分——而这往往是对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进行讨论时被忽略的一面。在伊德看来，越是好的技术，就越能融入到人的身体知觉中，进而实现最大程度的“透明性”（transparency）。这就好比海德格尔所指的工具的“消失”或“退却”。但是，他也同样意识到，这种完全的透明性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现实的或物质的技术只能实现部分透明性或准透明性（quasi-transparency）（伊德，1990/2012：80）。可见，技术纳入人身体的程度越高，二者之间的具身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弱。具身的强弱之分意味着技术具身并不一定要求技术在身体中的直接嵌入，而应该是人对技术的纳入；它强调的是人和技术之间有一种融入的感受，却并不一定要求身体和技术之间有一个实体性的接触——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伊德自己在描述具身关系时举到的“（我-窗户）→世界”这样一个例子中便可见一斑。因此，倘若进一步从具身的强弱入手理解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它们无疑是一种弱具身媒介，借用伊德的具身模型，它们和人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我-大众媒介）→新闻事件。而前面提到的身体媒介和手机、VR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媒介则是一种典型的强具身媒介。这样看来，每一种媒介似乎都应该含有一个具身的维度。

## 六、进一步讨论

在对“具身”的意涵，新闻传播中对“具身”的讨论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介绍和交代后，有必要回到上一部分一开头提出的问题，即“代理”和“具身”



之间如何形成某种理论上的对话和勾连。在我们看来，这两类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无论是“具身”，还是“代理”，都被普遍用以讨论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二者能够形成理论对话的根本前提。同时，二者的共同指向在于都将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双向关系。在“代理”中，人和技术彼此“授权”，互为对方的代理人。而尽管“具身”强调的是人和技术融为一体的整体感，但是一方面，技术融入到人的身体经验之中，并由此放大或缩小人的知觉体验；另一方面，技术的知觉调节与转化又是建立在人的身体知觉之上——也就是说，技术也不能离开身体而单独存在。这也就是伊德在讨论具身关系时为什么会强调技术具身意味着对身体能力的拉回，指向于对身体能力的重新聚焦：“……技术将能看到的東西帶到正常的身体空间和距离中……具身关系中的这些变化与没有中介的情形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在两者中保持不变的是身体的聚焦，能够重新指向我的身体能力。”（伊德，1990/2012：84）因此，尽管没有做这方面的专门讨论，但在伊德对“具身”的理解中，仍然存在着知觉和技术（或者说人和技术）的相互形塑。应该说，这两个术语都看到了人和技术之间的共生与互动关系，能够超越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或“人类中心说”。

其次，“具身”和“代理”彼此隐含着对方的意涵。就“具身”而言，技术纳入到人的身体之中，和人一起成为了和世界接触的整体，这无疑是技术授权给人，通过其人类代理以展演技术的特性与价值；同时，在“具身”中，人的知觉感受又是在技术的居间调节中得以实现——换句话说，人的身体经验是在技术中被赋予或激活的，这又意味着人对技术的授权，从而技术成为了人的代理。举个例子来说，当我戴上眼镜后，是眼镜在代替我看世界。就“代理”而言，以盖瑞对代理的讨论为例，他认为人和机器成为彼此代理的前提是人和机器之中各自嵌入了对方的属性，这无疑是一种人对机器的纳入和机器对人的纳入。关于前者，即人对机器的纳入，是一种典型的具身关系；至于后者，即机器对人的纳入，如果从技术具身的角度理解，则是一种技术在人的身体中的完全纳入而导致的肉体化身体的消逝，其充分展现出伊德所谓的完全“透明性”。当然，这里的“透明性”并非技术的透明性，而是身体的透明性。

再次，“具身”和“代理”彼此关联、互为存在。“代理”首先是以“具身”为前提的。即先要有人对技术的纳入或技术对人的纳入，才能有人作为技术的代理或技术作为人的代理去实现某些任务或意图。同时，如果没有“代理”中的实践与

行动，“具身”也失去了讨论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层面上看，“具身”可以看作是人-技关系中一种稳定的、静态的结构，“代理”则更应该从人-技关系中一种发展的、动态的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且，作为行动的“代理”是建立在作为结构的“具身”之上的。这就提醒我们，在讨论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时，应该将静态的“具身”和动态的“代理”结合在一起考察。

最后，就某些方面而言，“代理”比“具身”更加具有解释上的优势。尽管作者承认“代理”和“具身”较之于传统理论视野都是一种突破，并且强调对人-技关系的考察应是二者的结合。但是，如果单独来看，作者以为，“代理”的解释力还是比“具身”更强一些。这是因为，在“具身”的视野中，技术始终被置于一个客体化的存在之物这样一个位置上。这从伊德对技术的定义中便可见一斑：“技术是我们在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使用的那些物质文化的人工物。”（伊德，1990/2012：1）并且，在伊德对人-技关系的讨论中，他反复都在强调技术的物质性。由此可见，在伊德的观点中，技术是不能与人分离而存在的。而“代理”视野下的技术物往往被赋予了行动者的角色。因此，技术物不再是一个伊德视野下的物质性客体，而变成了和人一样，拥有自身能动性的行动者。换句话说，技术成为了与人相对称的“他者”。于是乎，技术和人的主体性都得以凸显。这样一个视角，无疑更加具有“后人类”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看，倘若后续新闻传播研究对媒介技术的讨论能够引入“代理”这样一个维度，无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既有“具身”视野的扩展和补充。

无论是“代理”还是“具身”，其理论内涵均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对于这样一些理论的介绍，主要还是围绕“牧影”来展开的。如前所述，通过对“牧”字的考释，我们发现，政治意涵方面，中文“牧”字中的某些含义与源于西方的“代理”概念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只是“牧”字本身不具备概念的含义，结合我们所考察的特定的现象所得到的“牧影”，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概念的意义。同时，由于流动电影放映本身是一项与技术密切相关的活动，这又使得关于“代理”的相关论述中的另一个方面——技术与人的关系同样能够进入到“牧影”这一概念中。进而，关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讨论，又使得“牧影”概念自然延展到关于“具身”（或是“具身传播”）的讨论中。通过这样的耙梳，一个不经意中想到的概念——“牧影”，成为了一个不错的既能把流动电影放映这样一种当下的实践与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有效勾连，同时也能与来自西方的相关理论话语进行有效地嫁接的“节点”。

## 七、结语

基于中国流动电影放映特定的经验现象所得到的“牧影”概念，本文在简单呈现了几个经验材料的片段之后，对“牧”字进行了考释，进而延展到“代理”“具身”等理论，使得“牧影”的内涵不断地被赋予。这样一种“缝合”的工作，其实也是田野研究的一种“常规”路径，我们的期望是其能够对经验现象做出一种学理化的阐释，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理论。是否达到了这样的目的，还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束开荣）

## 注释 [Notes]

1. 此表述是根据康巴藏语读音所做的拼写，意为“流动电影”。感谢西藏民大泽玉博士及昌都市丁青县觉恩乡放映员洛松次培协助翻译。
2. 作者指本文第一作者。全文同。
3. 这一表述最早是由中国人民大学雷蔚真教授建议的，他是这一概念的发明人，我们只是在他提出这一概念之后做了必要的理论意涵的完善及经验现象的补充。
4. 云南大学学生李兴博帮我们整理了繁琐的视频访谈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5. 2010年8月9日曹云雯、陈静静对甘孜州康定县放映员ZDM的访谈。
6. G为作者，M为毛羽副局长。
7. 陈静静认为，尽管体制外的放映员没有明确的“公家人”身份，但持有并使用国家委托的数字电影放映机，通知村长配合观影等环节，使他们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国家权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用“临时代理人”来解释他们特殊的政治身份应该是贴切的。
8. 关于流动电影放映制度的变迁，作者已在专著《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中进行过详述。
9. 这从电影放映过程中放映员经常离开抽烟，和当地百姓聊天，甚至一起喝酒、打牌中便可佐证。
10. 伊德将“身体”区分为身体一（body one）和身体二（body two）：身体一是一种活的、此在化的实在身体；身体二是一种被政治、文化和社会构建的权力身体。他认为，技术可以制造一个技术化的“桥梁”联结身体一与身体二，从而人的身体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身体：技术身体。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布莱恩·拉金（2008/2014）。《信号与噪音：尼日利亚的媒体、基础设施与都市文化》。

- (陈静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曹钺，骆正林，王颀濛（2018）。“身体在场”：沉浸传播时代的技术与感官之思。《新闻界》，（7），18-24。
- 陈剑波（2006）。农地制度：所有权问题还是委托-代理问题。《经济研究》，（7），83-91。
- 陈静静（2015）。《制度变迁与权力流动——康区流动电影放映研究》。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论文。昆明。
- 陈盛伟，岳书铭（2006）。乡镇政府“谋利性政权代理人”行为的分析。《中国行政管理》，（3），92-94。
- 丁煌，定明捷（2008）。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政策执行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6），17-22。
- 高莉莎（2018）。《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昆明。
- 郭建斌，刘展（2011）。从“制度人”到“社会人”：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中国传媒报告》，（3），88-103。
- 郭建斌（2014）。“电影大篷车”：关于“多点民族志”的实践与反思。《新闻大学》，（3），45-50。
- 郭建斌（2015）。《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北京：民族出版社。
- 郭建斌（2016）。国家电影：滇川藏“大三角”地区流动电影之田野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5-76+130-131。
- 郭建斌，方鑫，念鹏帆（2017）。反身性问题：基于一组人类学影像实践的讨论——兼而反思田野作业。《新闻与传播评论》，（冬季号），24-46。
- 郭建斌，张静红，张翎，陈静静（2018）。“视觉展演”：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实践的文化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4），57-75。
- 郭建斌，陈静静等（2018）。《电影大篷车：电影与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社会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
- 郭建斌（2019a）。“在场”：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媒体人类学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11），37-54+127。
- 郭建斌（2019b）。《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何静（2019）。具身性观念：对理智传统的克服与超越——以梅洛-庞蒂和米德为中心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9），72-76。
- 黄旦（2016）。“千手观音”：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探索与争鸣》，（11），20-27。

- 江依妮, 曾明 (2010)。中国政府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代理人危机。《江西社会科学》, (4), 204-208。
- 李春成 (2000)。信息不对称下政治代理人的问题行为分析。《学术界》, (6), 31-44。
- 李道新 (2006)。露天电影的政治经济学。《当代电影》, (3), 97-101。
- 李祖佩 (2016)。“新代理人”: 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社会》, (3), 167-191。
- 林升梁, 叶立 (2019)。人机·交往·重塑: 作为“第六媒介”的智能机器人。《新闻与传播研究》, (10), 87-104+128。
- 刘广宇 (2007)。新中国红色放映员的身份确立与想象。《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 120-124。
- 刘广宇 (2008)。1949-1976年: 江津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历史沿革及运作机制。《当代电影》, (10), 61-65。
- 刘海龙 (2018)。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国际新闻界》, (2), 37-46。
- 刘海龙, 束开荣 (2019)。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80-89。
- 刘明洋, 王鸿坤 (2019)。从“身体媒介”到“类身体媒介”的媒介伦理变迁。《新闻记者》, (5), 75-85。
- 刘寿明, 陆维臣 (2009)。公共领域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及其拓展。《求索》, (4), 69-70+40。
- 刘婷, 张卓 (2018)。身体-媒介/技术: 麦克卢汉思想被忽视的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 (5), 46-68+126-127。
- 刘智睿, 申明锐, 张京祥 (2018)。项目制驱动下的临时代理人模式及其治理困境——基于南京市杨柳村的观察。《现代城市研究》, (12), 119-124+132。
- 罗慧, 王毅敏, 仲伟周, 顾润源 (2005)。生态治理中政府部门代理人道德风险因素分析。《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 (2), 119-123。
- 莫里斯·梅洛-庞蒂 (1945/2001)。《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倪星 (2002)。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728-733。
- 倪星 (2009)。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 148-157。
- 孙玮 (2018)。赛博人: 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 (6), 4-11。
- 孙玮 (2019)。交流者的身体: 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国际新闻界》, (12), 83-103。
- 谭雪芳 (2019)。图形化身、数字孪生与具身性在场: 身体-技术关系模式下的传播新视

- 野。《现代传播》，（8），64-70+79。
- 唐·伊德（1990/2012）。《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丽娜（2019）。在场·转场·守望——评《在场：流动电影与当代中国社会建构》。《魁阁》，（2），279-289。
- 王阳，曹锦清（2017）。基层代理人与规模治理：基层政府的社会组织化逻辑——基于上海市的治理经验。《上海行政学院学报》，（3），88-95。
- 王玉琼（2004）。耕地保护与政府职能的相关性分析。《农业经济问题》，（4），57-61。
- 王振海（2003）。论政府的代理身份与代理行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93-99。
- 吴倩（2019）。从意识沉浸到知觉沉浸：赛博人的具身阅读转向。《编辑之友》，（1），20-24。
- 吴毅（2002）。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11），78-85+155-156。
- 徐霞翔（2009）。透视农村电影放映员：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江苏省为例。《二十一世纪》网络版（香港），（84）。
- 叶浩生（2011）。身心二元论的困境与具身认知研究的兴起。《心理科学》，（4），999-1005。
- 张启忠（2010）。“露天电影”与农村的文化启蒙——十七年农村电影放映网的历史分析。《艺术评论》，（8），49-54。
- 张新科（2006）。文化掮者·社会徙者·政治佣者·生活使者：二十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33-38。
- Eisenhardt, K. M.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1), 57-74.
- Gary, D. L. (1998). *The Machine In Me: An Anthropologist Siting Among Computer Engineers*. London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Moe, T. M. (1984).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4), 739-777.
- Ross, S. A. (1973).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2), 134-139.
- Shapiro, S. P. (2005). Agency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1), 263-284.
- Verbeek, P-P. (2006). Materializing Morality: Design 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1(3), 361-380.
-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